

KOREAN POLITICS

韓國現代政治

森山茂德◆著 吳明上◆譯



韓國現代政治

森 山 茂 德 著
吳 明 上 譯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韓國現代政治 / 森山茂德著；吳明上譯.--

初版.-- 臺北市：五南, 2005[民 94]

面；公分

ISBN 957-11-3893-2(平裝)

1. 政治 - 韓國

574.32

94002579

1PL3

韓國現代政治

作 者 森山茂德

譯 者 吳明上

編 輯 鍾嫣慧

出版者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楊榮川

地 址：台北市大安區 106
和平東路二段 339 號 4 樓

電 話：(02)27055066（代表號）

傳 真：(02)27066100

劃 撥：0106895-3

網 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顧 問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

版 刷 2005 年 3 月初版一刷

定 價 390 元

有著作權・請予尊重

序 言

～轉換期的韓國政治～

韓國的政治變動

九八〇年代至今，國際環境與朝鮮半島的政治情勢有了極大的變化。柏林圍牆倒塌後，緊接著發生蘇聯的解體和分裂，以及蘇聯陣營諸國的紛紛獨立等重大事件，從政治、軍事、經濟、思想等各種層面觀之，均意味著冷戰的結束。此種國際環境的變化亦大大影響了朝鮮半島的情勢。首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為北韓）幾乎再也得不到長久以來的蘇聯的援助，而加速了經濟的惡化。而且，從一九九四年七月金日成主席逝世開始，為期三年的國喪時間結束之後，雖然金正日總書記的繼承體制誕生了，但是北韓經濟狀況的恢復尚需相當長的時間。而大韓民國（以下簡稱為韓國）方面，一九八七年的「六月民主抗爭」激發出「民主化宣言」後，一九九二年更產生了睽別三十年之久的文人總統。而且，在一九九一年恢復了地方選舉，一九九五年再擴大舉行範圍。緊接著，韓國於一九九七年舉行總統大選，選舉結果首次實現了朝野政黨之間的政權和平轉移。外交方面，韓國於一九九〇年與蘇聯、一九九一年與中共建立邦交、一九九一年九月與北韓同時進入聯合國。

然而，上述的國際環境的變化與朝鮮半島的政治情勢之間，到底有何互動關聯性？韓國的政治發展目前正處於何種階段？今後將會如何變化？對於上述的問題，本書嘗試以「韓國的政治正處於轉換期」的觀點來解答。亦即，本書將一九四五年的解放，至一九四八年的南北分裂的期間，所形成的韓國政治，稱為「分裂體制」，並視為時勢所趨的變化，此意味著韓國的政治處於轉換期。所謂的「分裂體制」係指威權主義的政治體制。詳言之，「分裂體制」係以敵人的存在為前提，為了與敵人對抗、競



爭，而將國民作為動員與統治的對象的政治制度。因此，為了瞭解現代的韓國政治，必須探討國際環境與「分裂體制」形成前的韓國政治的傳統架構。此亦為本書所採取的立論基礎。本書在展開論述之前，先就關於韓國政治及其變化的既有的各種解釋做一個概觀。

首先，關於國際環境與朝鮮半島的政治情勢之間的互動關聯性的分析，並無具有說服力與系統性的見解。¹ 其最主要的理由是，形成「分裂體制」的分裂狀態至今依然繼續存在著。原先預定於一九九四年舉行的南北首腦會談，因金日成主席的逝世而告中斷，因此更遑論南北韓之間的直接對話了。然而另一方面，緩和南北韓緊張關係的嘗試卻逐步的正在進行

1 多數關於朝鮮問題的論述係以「冷戰結束即等於後冷戰」為前提，將論點集中於如何來構築朝鮮半島和平的條件。因此，關於國際環境的變化與朝鮮半島的政治狀況之間的關聯性的系統論述與研究則幾乎不存在。例如：小此木政夫的論文「朝鮮半島の冷戦終結」（小此木政夫編《ポスト冷戦の朝鮮半島》，一九九四年，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即為代表性的例子。以東亞的冷戰結束為主題，探討「區域紛爭的局地化」、「漸進的體制改革」、「核武器與飛彈的擴散防止」等三個課題的成立條件。換言之，以「在朝鮮半島尚未形成後冷戰的國際體系」為論述的前提，對其理由確實作了詳細的說明。但是，關於國際環境的變化對南北韓所產生的影響，則僅止於討論北韓的對應。再者，倉田秀也的論文「朝鮮問題多国間協議の『重層的』構造と動揺」（岡部達味編《ポスト冷戦のアジア太平洋》，一九九五年，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將「局地化」、「國際體制」、「區域秩序」等「三位一體化」作為和平的條件並詳加論述，但未對與國際環境變化的關係作明確的說明。坂本義和的著作《相對化の時代》（一九九七年，岩波書店）一書中，以「相對化」的觀點來討論冷戰時期朝鮮半島政治狀況的變化。雖然論及亞洲冷戰的「三重」的「相對化」，以及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普及於朝鮮半島的情形；雖然觸及民族統一與市民社會之間的關聯性的重要性，卻未充分的分析冷戰結束對南北韓的政治體系有何影響。

再者，關於韓國的研究方面，崔章集的著作《現代韓國の政治變動：近代化と民主主義の歴史的条件》一書，雖然論及國際環境的變化與朝鮮半島政治的變化之間的關聯性（例如，頁 201～202），但也未作體系性的論說。

著。例如，「四邊會談」的舉行，或是設置「朝鮮半島能源開發機構（The Korean Peninsula Ener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KEDO）」，以解決北韓的核能開發問題等等。而且，韓國亦捨棄傳統的統一政策，改採和平共存的務實政策。因為韓國認為，若因體制競爭勝利，而以合併的方式來統一北韓，則造成的成本與負擔將過重。此外，北韓在金正日體制成立之後，為了恢復經濟狀況，開始逐步採用改革開放政策。而且，南北韓之間的貿易有大幅度增加的傾向，以商務人員為主的人員交流亦漸趨頻繁。最近明顯的現象是，北韓流亡者的人數有快速增加的情形。上述的狀況是南北韓分裂狀態形成之後才開始出現的。若是如此，為了瞭解現在的韓國政治狀況，需要一個觀察的切入角度，亦即如何說明「分裂體制」的變化。而在說明國際環境的變化與朝鮮半島的政治情勢之間的關聯互動時，若是欠缺此視點，則不具說服力。

其次，關於「分裂體制」如何變化的既有見解也不具說服力與系統性的分析。理由之一是一連串的韓國民主化運動尚未對「分裂體制」發生影響。近年來，「六月民主抗爭」在現在的韓國並未獲得高度的評價。將「六月民主抗爭」視為「分裂體制」的延續，具有高度的說服力。²被稱為民主化的韓國政治變化到底具有何種意義，是威權主義體制的瓦解？是民主主義體制的落實？是「市民社會的成立」？還是「社會空間的擴大」？韓國政治的變化是隨著韓國獨特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性格而變化的？還是隨著被稱為國家意識，或國民意識而變化的？再者，政治與經濟間的關係為何，是經濟隨著民主化而持續成長？還是經濟構造被改革了？最後，最重要的是，這些變化與「分裂體制」之間有何關聯性？亦

2 白樂晴的論文「『六月民主抗爭』の意義を考える」（《世界》，第六三八號，一九九七年八月）使用「分裂體制」的概念，並指出一般研究對此概念認識不徹底，進而強調「將韓國社會的民主化及內部改革問題與分裂之間做聯結並加以理解」是重要的。該論文對「分裂體制」的論述對本書具有啟發性的作用。因此，本書以歷史性的、內視性的觀點來對「分裂體制」的相對化作學術上的分析。



即，是促使「分裂體制」變化？或是不促使其變化？現今，上述的疑問正逐漸明朗化。

關於韓國政治的變化，有二個代表性的論點。第一個是通說性的解釋，主張韓國的民主化在歷經解放、威權主義體制的瓦解，以及「民主化宣言」之後至今，仍然持續進行著，在民主主義的落實過程中，並未中止。³換言之，韓國的政治歷經了解放之後的威權主義體制，以及民主主義體制的變化，亦即民主化的政治變動。若是根據政治民主化的解釋，則擴大舉行地方選舉，以及金大中總統的當選，均包含在民主化的政治變動脈絡之中。此為在肯定長期民主化運動的觀點下的必然解釋。然而，誠如上述，對於「六月民主抗爭」的低評價，以及選舉時的地域主義的傾向，均降低了此種解釋的說服力。亦即，「六月民主抗爭」之後，民主化運動勢力與在野黨勢力的分裂，以及地域主義的興起等等，與民主主義是否存在著矛盾？上述通說性的論點並未能提出有效的解答。而且，上述論點對於「分裂體制」與民主化的關係，除了強調民主化對朝鮮半島全體的重要性之外，並未進行理論性的探討。再者，亦未探討與「分裂體制」有著密切關係的韓國的民族主義，以及其與民主化的關係。亦即只探討了民主化的要素，至於其他相關要素則未做理論性的分析。

第二個論點是從「民主化的轉型」與「民主主義的落實」的觀點出發，區別「手續性的民主主義」與「實質性的民主主義」的差異，並使用「市場經濟化」以及「經濟民主化與自由化」的概念，將韓國的政治視為民主主義落實過程中的「委任民主主義」。但是，此解釋對於民主化之外的不同面相並未提出系統性的說明。

3 孔星鎮的論文「韓國政治のダイナミズム」（孔星鎮、川勝平太編《韓國の政治》，一九九七年，早稻田大學出版部），以及慎斗範的著作《韓國政治の現在》（一九九三年，有斐閣）均介紹了安秉萬在《韓國政府論》（一九九八年，漢城，茶山出版社）一書中提出的「獨裁政權的輪替」的循環理論。

第一個解釋因為以民主化的觀點來觀察韓國政治的變動，所以將其他的要素排除在民主化的架構之外。例如，此解釋未討論推動韓國政治的重要要素——民族主義。即使將其他要素包含在內，亦只不過是說明該要素與民主化的關係，未必將韓國政治的複雜性，以及「分裂體制」與民主化的關係包含在內。亦即缺乏歷史性的與內視性的觀點。

第二個解釋是從政治變動論的角度來說明韓國政治的變化。例如，將焦點置於韓國政治的變遷，並視之為「連續革命的歷史」，即為一個代表性的例子。⁴若是根據此一解釋，首先，解放後的韓國政治將是「對朝鮮

4 此節關於朝鮮時代的民族主義方面，也將之視為韓國民族主義而作統括性的討論。而關於韓國民族主義的系統性研究意外的稀少。其中值得提起的是李用熙的《韓國民族主義》（一九九七年，漢城，瑞文堂）、亞細亞政策研究院編的《韓国イデオロギー論：韓國民族主義の理念》（日語版，一九七八年，成甲書房）、崔章集的《現代韓國の政治變動》，以及木村幹的一連串著作（從《「小國意識」とナショナリズム》、《愛媛法學會雜誌》（第二十二卷，第三・四號，一九九六年三月）到《「臣民」からネーションへ》（同前，第二十三卷，第二號，一九九六年九月））。李用熙的研究以歷史性、理論性的觀點來探討韓國民族主義，對於「抵抗民族主義」有明確的論述，是先趨性的研究。且其中提及的諸問題至今仍極具參考價值。例如：王朝史、政權史與民族史的乖離、民族像的獨特樣式、指導者的分裂等韓國民族主義的特質，以及「分裂體制」的克服等。其次，亞細亞政策研究院與崔章集的研究繼承了李用熙的研究成果，在各個時點上探討了韓國民族主義的問題點，前者探討了民族主義與其他的意識型態之間的關聯，後者則論述了韓國政治的特質，特別是近代化與民族主義的關係。

韓國研究的共通點是，作為「抵抗民族主義」的韓國民族主義在歷史上被視為是前近代的產物，也是近代國民國家形式上的障礙。而且，為了反應出各自時點上與政治課題的緊張關係，而做理論上的爭論，故而欠缺了其他的觀點。再者，木村幹的研究則在韓國民族主義與近代化的關係中，加入了「小國意識」的概念，從民族主義的成立到李承晚時代為止，探討此三者之間的複雜關係，其研究成果極富啟發性。但是，例如關於「抵抗民族主義」的形成方面，木村幹主張「小國意識」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性，但對於其他的論述則稍不足。而關於「分裂體制」方面，亦僅論述了李承晚時代的民族主義，而且也未有充分的分析說明。



王朝支配理念的反動」，是「國民的『野性』」所表現出來的「連續的革命」；其次，基於所謂的循環論的革命理論，一九八〇年代的韓國政治歷經了七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支配階級的僵化，第二個階段是大眾的疏離、抵抗及暴力，第三個階段是軍事政變，第四個階段是中道安定勢力的掌權，第五個階段是理想性的、激進性的要求以及口號的橫行，第六個階段是極左或極右勢力的掌政，第七個階段是政治報復與安定。韓國政治經歷了此七個階段，並產生了變化。現今，韓國的政治變化正位於轉換點之上。亦即，韓國政治將會再度回到第一個階段，或是因為「國際化」而使得「野性」消失不見（放棄革命而與世界協調）。此解釋有二個特徵。第一個特徵是，與第一個解釋不同，因為未假定政治變動的目的為邁向民主主義體制。第二個特徵是，將韓國政治變動的原動力，視為否定傳統政治架構的能量。然而，此解釋存在著以下幾個問題點：第一，未充分說明「革命」的目的為何。或許「革命」的目的是民主化與近代化，但是，以「反動」或是「連續的革命」來解說卻又欠缺明確性。第二，因為是以循環論的模型為根據，所以對現實的說明不足。再者，對於解釋模型範圍之外的現象，不是未做概念性的說明，就是唐突的引用其他的概念。例如，對於「極左」與「極右」同時混雜存在的韓國政治的解釋不具備說服力。又對於將來的發展性的解釋，係以模型之外的要素來解釋，導致否定了模型的有效性。甚且，即使提及民族主義，亦完全未論及民族主義的特徵。最後，最重要的是對於「分裂體制」與政治變動的關係完全未作解釋。簡言之，此解釋並未充分具備歷史性的與內視性的視角。

此外，另一種循環論的解說是，以文人政權的成立作為分水嶺，而被視為「『例外』時代」的軍事政權時代已經結束，韓國的政治回復到軍市政權時代之前，亦即回到所謂的「『通常』政治」的時代。此種論述以追溯過去的歷史，來突顯出現代韓國政治的特質，並強調韓國政治的連續性，是頗富啟發性的。然而，正因過於強調韓國政治的連續性，而忽略了國際政治的變化與韓國政治的變化之間的互動關聯性，以及忽略了民主化的進展。而且，現在的韓國政治與軍事政權之前的政治存在著許多的差

異，對於此點亦未作有力的說明。再者，對於「分裂體制」的變化也隻字未提。換言之，雖然具有內視性的觀點，卻缺乏歷史性的、階段性的觀點。

相對於以上既有的二種解釋，本書提出第三種解釋，亦即認為韓國政治現在正處於轉換期。轉換期的意味係指，既有的政治的架構——「分裂體制」無法繼續適應國際環境的變化，而被迫改變。雖然新的架構尚未出現，但是現存的架構開始在解構當中。例如，韓國的經濟構造隨著與世界經濟相互依存的進展，而逐漸在改變。又，北韓不得不採取改革開放政策，而導致南北關係需要新的架構。若將國際環境的變化與韓國政治的變化作連結性的思考，則不僅將韓國政治的變化視為民主主義的落實，或是循環論的政治變動，而且「分裂體制」的既有架構亦開始在解構當中。韓國政治即將達到新的階段之際，必須採取歷史性的、內視性的觀點來剖析。換言之，分裂後的政治變動是在「分裂體制」架構中進行的。因此，在考察政治變動之際，必須探討「分裂體制」是否有變化。本書提出的解釋是：此架構現在已經正在變化當中。

誠如上述，本書主張韓國政治正處於轉換期。韓國政治的變動因為「分裂體制」的變化，才終結該循環。民主主義的落實與循環論的政治變動等觀點無法解釋此一變動。而且，將「分裂體制」與國際環境的變化、「分裂體制」之前的政治傳統架構作一個連結性思考，才有可能理解政治變動後將出現何種政權。簡而言之，本書的立場是以「分裂體制」作為一個分水嶺，思考從解放至今的韓國政治，在「分裂體制」成立的前後產生何種變化。一言以蔽之，這是歷史性的、內視性的分析。而本書的課題是欲解明下列的疑問：何為「分裂體制」？「分裂體制」的形成要因為何？韓國政治如何受到影響？現在又有何變化？以及即將如何變化等等。



韓國的民族主義

本書為了解明何為「分裂體制」，特別將焦點置於韓國的民族主義。因為，韓國的民族主義在解放後的「分裂體制」中被強化了，同時韓國的民族主義也補強了「分裂體制」。換言之，「分裂體制」與韓國的民族主義是互補的關係。因此，為了解「分裂體制」，必須先行探討韓國的民族主義具備何種特質，以及是如何形成的。而且，至今的韓國民族主義與國際化或是國際主義、民主化或是民主主義、近代化，特別是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產生了特殊且複雜的關係。其原因有三，一為朝鮮有著曾遭受他國侵略的經驗，二為受到日本的殖民統治，三為南北分裂的現狀。以下對此作一個概述。

首先，韓國的民族主義在形成過程中，與國際化或國際主義形成特殊的對立關係。朝鮮民族在形成之前，原本已經確立了民族與文化的統一性。另一方面，朝鮮屢受他國的侵略，而且被迫臣服於大國。所以，國際化是被迫接受的結果。同時，為了保持民族與文化的統一性，與國際化對抗之下，逐漸使民族主義形成純粹化與孤立化。因此，韓國的民族主義與國際化或國際主義之間，具有相對立的特性。而且，此特性往往造成韓國內部階層的分裂。一方面，韓國國內的政治精英擁有國際化，或國際主義的傾向。相對地另一方面，一般的庶民並未被國際化，甚或反抗國際化的傾向。然而，正如十七世紀形成的「小中華主義」一般，對外關係的緊張促使政治精英與一般庶民接近，甚至導致民族主義的純粹化與孤立化。二十世紀重複著同樣的情形。換言之，透過殖民地化的過程，某種的國際化或國際主義伴隨著日本的殖民地化而進入韓國。而當韓國國民的反日獨立聲音受到國際社會漠視之際，此種反日情緒促使了政治精英與一般庶民的接近，將正在形成的韓國的民族主義導向純粹化與孤立化。因此，韓國在摸索民族的獨特性來取代從屬性之際，認為在道德上超越了日本。此時，

在韓國的民族主義之中出現了「抵抗民族主義」的要素。而且，在殖民地化以前，韓國國民就已經擁有國際化的民主主義，只是無實踐的機會。因為將民族的獨立視為最優先的課題，所以「抵抗民族主義」的要素在韓國的民族主義中才會特別顯著。此外，因為在殖民地期間也引進了社會主義，而使得情形更加複雜。因為一部分的政治精英擁有社會主義的國際性，所以導致政治精英的分裂。因此，解放之後，奉行社會主義國際性的政治精英在成立北韓政權之際，社會主義與韓國的民族主義形成了敵對的關係。相對於社會主義的國際性，韓國的民族主義成為「抵抗民族主義」。

然而，隨著解放而引進美國式的民主主義之後，政治精英再度獲得國際化的機會。但是，實際上成立的政治體制並非真正的民主主義體制，而只是擁有民主主義體制的外表，實際上卻是接受美國奧援的威權主義體制，亦即「分裂體制」。而且，形成並維持「分裂體制」的是韓國的民族主義。政治精英也出現分裂的狀態，政治精英不是不足以推動韓國的民族主義，而接受威權主義體制，就是足以推動韓國的民族主義，而在思想與運動上推動民主主義。另外，一部分的政治精英主張南北統一，亦即「南北協商路線」。因為與「分裂體制」相對立，所以無法形成多數派。而一般庶民對威權主義體制逐漸感到反感，轉而支持韓國的民族主義。但是，另一方面卻也同時成為威權體制動員的對象，而不得不臣屬於威權主義體制。一九五〇年的韓戰對於「分裂體制」的成立以及與美國的關係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換言之，「分裂體制」成立之後，美國支援韓國的民族主義，而且韓國對美國的依賴在冷戰構造之下形成慣性現象。然而因為未普遍化之故，所以一般庶民並未意識到與民族主義相對立的國際化。結果，韓國的民族主義在「分裂體制」之下，一方面依存於美國，一方面再度與國際化或國際主義形成對立的現象，強化了純粹性與孤立性。但是，冷戰的結束使得韓國的民族主義必須面對以經濟壓力為主的新國際化或國際主義。韓國的民族主義與國際化或國際主義之間的關係正邁向一個新的階段。



第二，關於韓國的民族主義與民主化或民主主義的關係方面。韓國的民族主義對民主主義原本具有某種的親和性。因為韓國的民族主義的目標——國民國家的形成與朝鮮時代的王朝的政治架構及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架構，換言之，與威權主義體制甚或是專制政治之間，本來具有相對立的性格。雖然民主主義是外來的，但是在殖民地化以前，韓國國民就擁有民主主義的意識。然而，日本的殖民地化給韓國民族主義帶來不同的面向。詳言之，一方面，因為抵抗的對象是殖民地化時期的日本，以及之後的日本統治時期中的國王以及傳統的政治精英，所以，韓國的民族主義在抵抗外來的權力與權威中成長；另一方面，韓國的民族主義卻又包容了傳統權威與政治精英。在形式上告別傳統式的權威乃是遲至一九一九年三一獨立運動之後的事。然而，其後的獨立運動卻形成分裂的狀態，而且解放之後又形成南北朝鮮的分裂。在南北對峙之下，仍然傾向將民族運動的核心置於政治精英，或是置於實際上不存在卻被冀求的強勢領導者，此一傾向成為威權主義形成的背景之一。

韓國的民族主義是促使「分裂體制」形成的因素之一。雖然，對抗權威主義曾經是韓國民族主義的重要要素，但是，並未具體的表現出來。正因為如此，導致了政治精英的分裂，提倡民主主義的政治精英無法獲得民眾的支持。在「分裂體制」下，權威主義的政治行動模式得以延續，甚或被強化，韓國的民族主義有時以與民主主義對立的方式呈現出來。然而，民主主義也因此而復活。其最大的理由是，因為一九七〇年代以後的軍事政權中，權威主義體制壓迫一般的庶民，甚至實行鎮壓的手段。此意味著軍事政權的性質與以往的王朝政權及日本的統治權力並無差異。一部分的政治精英在推動對抗運動時，獲得一般庶民的支持，一般庶民也意識到了對抗權威主義的必要性。國際環境中冷戰的變化，以及韓國的經濟成長，助長了對抗運動的發展。因此，韓國的民主化與其說是起因於民主主義國際性，不如說是民主主義與韓國民族主義原本就具有親和性，而當此親和性被發覺時，民主主義就逐漸的顯現出來並落實。然而，當壓迫一般庶民的權力消失，韓國的民族主義與民主化結合之際，民主化並非毫無改變的

自動被落實。民主主義與韓國的民族主義的關係又邁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第三，關於韓國的民族主義與近代化之間的關係。韓國的民族主義標榜著國民國家的形成已經具備了與近代化之間的親和性。但是，自律性的近代化因為日本的殖民地化而遭到挫折。在日本引入日本式的近代化時，韓國的民族主義是與之對立的。然而，所謂的日本式的近代化係指中央集權化、資本主義、對日本忠誠，及以利益為基準的合理化的人際關係。特別是日本式的資本主義，即使具有殖民地的性格，但也具有壓倒性的影響力。韓國的民族主義因而分裂為三，一為接受了近代化的恩惠而包容之者（稱為「協力機制」或「外勢依存型」），二為因為無法接受恩惠而反抗近代化者，三為雖然反抗近代化卻又不得不與之協調者。因為傳統的政治架構的要素——中央統治型的政治曾經存在，所以韓國的民族主義對中央集權的反抗比較微弱。然而，社會主義引進之際，韓國民族主義的分裂更形加劇。一部分的政治精英信奉社會主義，而與日本形成對抗的關係。他們意識到本身為韓國民族主義的推動者，因此批判並攻擊其他的政治精英。相對於此，對抗社會主義的精英從反社會主義出發，結果包容了資本主義，對抗社會主義或是資本主義的部分精英則回歸到韓國的傳統，摸索著民族的獨特性。一般廣大的庶民雖然對抗資本主義，卻又體認到必須包容資本主義，在此矛盾的心理下，也開始了摸索民族的獨特性。

資本主義壓倒性的影響力再度強化了韓國傳統中的人際關係。而且，以利益為基準的人際關係的合理化、以血緣、地緣關係為基準的人際關係，以及集團的一體化等三者以一種特殊的形式結合在一起。換言之，在殖民政權統治下，為了獲得並維持利益，動員了以血緣、地緣的關係所結合的人際關係網絡（network）。在此過程中，降低了韓國的民族主義中，國家或是國民等要素的重要性，而在摸索民族的獨特性的過程中，民族主義、文化性的統一性，以及將之具體化的血緣、地緣的集團等要素逐漸被重視，並且被強化。換言之，國家意識或國民意識變得稀薄，而民族的認同（identity）與血緣、地緣集團的認同則逐漸變得重要。



然而，在解放與分裂後的「分裂體制」中，韓國的民族主義又加入了其他的要素。此要素為「外勢依存型」。其原因是因為近代化的結果，特別是近代化之下，資本主義依存於美國的援助之故。若此為韓國的民族主義本來的樣貌，則資本主義化將成為被反抗的對象。但是，此種「外勢依存型」的資本主義化卻與資本主義體制的形成及民族主義的動員（「分裂體制」的成立）形成一體化的關係。因此，韓國的民族主義與「外勢依存型」的資本主義化相結合。再者，此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化並未使以利益為基準的人際關係合理化，而正在形成的財閥也由傳統的人際關係網絡來運作。軍事政權在國民經濟起步時，亦無法切斷對美國的依存。在國家的主導下，由財閥來推動經濟的運作。在「分裂體制」下，從傳統的人際關係網絡中獨立出來的資本主義型的人際關係的合理化極為困難。例如，利用傳統的人際關係網絡的權力所作的動員，或是對勞動運動的壓抑，均是明顯的例子。然而，隨著快速的經濟發展，傳統的人際關係網絡的基礎逐漸鬆動，勞動運動的組織化也在「民主化宣言」之後急速的展開。此發展延續至今，韓國現今仍受到國際上開放的壓力。近代化，特別是「外勢依存型」的資本主義與韓國民族主義的關係，以及資本主義式的人際關係的合理化正邁向一個新的階段。

誠如上述，韓國的民族主義在國際化、民主化及近代化等過程中逐漸形成，並在「分裂體制」下被強化，成為支持「分裂體制」的思想基礎。韓國的民族主義無法與「分裂體制」分開。韓國的民族主義與國際化、民主化、近代化的關係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韓國的民族主義與國際化、民主化、近代化的關係如何變化，將左右今後韓國政治的動向。韓國的民族主義在變化之際，「分裂體制」亦將隨之變化。韓國的政治正處於轉換期。

本書的觀點與構成

本書採用歷史性的與內視性的觀點來分析現代韓國政治。既然韓國政治正處於轉換期，則必須以歷史性的與內視性的觀點來解析過去的政治架構——「分裂體制」。此處所謂的內視性的觀點係指，解明韓國政治中，所存在的特殊的構造（mechanism）為何，而非採用特定的模型來分析韓國政治。而所謂的歷史性的觀點係指，該特殊構造如何被延續、強化，以及在其過程中，又增添了何種內容，或是失去何種內容，亦即解明其連續面與斷代面。

最後，本書採用此觀點的理由如下：第一，日本國內對韓國政治研究的通說內容，大致將韓國視為鄰國與殖民地支配的對象，比起他國對韓國研究的通說更為根深蒂固。例如，將韓國視為「東方禮儀之邦」、「儒教之國」、「黨派黨爭之國」、「反共獨裁國家」等等。而在學術上，則以「他律性史觀」、「停滯性史觀」等觀點來分析韓國政治。日本國內的通說之所以根深蒂固的理由有三：第一是將日本的殖民統治正當化，而此通說在戰後並未受到修正，且加以沿用，甚或被強化。日本的脫殖民地化因為戰敗之故，在學術上未被提出討論。第二是接著而來的冷戰也反映出國內意識型態的對立。第三是隨著日本的經濟成長，日本的經濟開始進出韓國。以上三個原因導致日本的韓國研究不關心韓國本身的問題。（即使表示關心，亦只是強調日、韓兩國的差異。）日本只關心日本的事情，只關注自己的問題，或是只注意日本能力可及範圍之內的問題，而未嘗試瞭解韓國。因此，當採用歷史性的與內視性的觀點時，才可能修正以上的通說與僵化的印象。

第二個理由是，至今分析韓國政治的模型未必是歷史性的與內視性的觀點。迄今為止，分析韓國政治的模型以美國學者韓德森（Gregory Henderson）的「旋風模型（the vortex）」最具代表性。此模型強調四個面



向，一為儒教的價值觀，二為政治權力的制衡關係，三為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多樣性，四為網絡所構成的特殊的人際關係。但是，此模型只重視某單面向，雖然有其特點，但亦有不足之處。亦即，未理論性地解說各個要素之間的關聯性。因此，本書雖然部分參考上述諸模型的觀點，但是不嘗試建構新的模型。本書的分析純粹是一種嘗試性的論說。

第三個理由是，關於日本的外國研究方面，對分析對象國的獨特性的研究尚嫌不足。例如，「民主化的轉型」也好，「開發獨裁」或是威權主義體制也罷，一般係採用特定的理論架構指出其共通性，而未注意分析對象國的獨特性，因此不能真正理解分析對象國。的確，世界性的共通點是存在的，冷戰又強化了此共通點。然而，基於某種理論架構可以分析世界狀況，但並不一定適合分析特定的國家。而且，對於某國或某地區的有效分析概念並不一定能適用於其他的國家或地區。現存的研究中，存在著只是將國家或地區的名稱作更換的草率研究，並未理解分析對象國的獨特性。只有採用歷史性的與內視性的觀點才能導正此缺失，並作比較研究。

此外，本書因為採用歷史性的與內視性的觀點來分析韓國政治的變化，所以對於北韓問題的處理，僅限於與本主題相關者，不作詳細的論述。但是，因為「分裂體制」是分析的主要對象，所以在論及「分裂體制」的形成與變化時，必須探討國際環境的變化，以及「分裂體制」形成前的傳統政治架構，在此脈絡之下，當然會論及與北韓的關係，因為北韓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基於以上的課題與觀點，首先，本書以歷史性的架構，從十七世紀的朝鮮王朝時代開始探討韓國政治的特質，以及其獨特性。接著，將焦點置於從「分裂體制」的成立到現在的政治變化，同時注意與傳統政治架構的連續面與斷代面。其次，探討現在韓國的政治制度及其特質。本書將現在的政治制度視為歷史性的產物，而且是在「分裂體制」下形成並變化產生而來的，且以當時狀況的要素來分析政治的實際運作。傳統的政治架構與現在的政治制度不一致時，可以用當時狀況的要素來作有效的解釋。最